

河长制之后,能否跟进推出危房房长制

省政协委员眼中的平安细节

本报记者 王索妮 摄影记者 陈立波

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很有味道:一是有山的味道,因为它务实厚重;二是有水的味道,因为G20,杭州变得灵动风韵;三是有海浪的味道,因为它干在实处、走在前列、勇立潮头……”省政协常委、省民政厅副厅长罗卫红话音刚落,现场立即掌声雷动。

昨天上午,参加浙江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委员们,分别以联组、分组的方式就政府工作报告展开热烈讨论。这其中,“平安浙江建设”成了绕不开的话题。委员们畅所欲言,力图让平安渗透在每一处细节中。



河长制之后 呼唤“危房房长制”

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,在全面建设平安浙江中,我省对农村危房改造20559户、城镇危险住房房屋解危15665幢。对于这串数字,省政协委员、浙江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露霞可谓感慨颇多。

2015年9月24日,浙江诸暨一幢6层高的居民小区发生坍塌,所幸的是,事发前一晚,该楼居民已被安全转移。而这个小区,正是陈露霞母亲的住处,那以后,陈露霞开始关注起我省危房的排危除险工作。

2013年2月,我省拉开“三改一拆”序幕,至今已过去四个年头。陈露霞说,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及工作接触中的情况来看,面上的工作已基本做到位,现在是时候把工作的重心转放到“排危、拆危”的深度和广度上来,对“三改一拆”进行转型升级了。

具体怎么做?陈露霞在现场大胆建言:“能否在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下专设排危、拆危工作小组,专职负责排危、拆危工作?能否借鉴‘五水共治’河长制好经验,对C、D级危房建立危房房长制,由专人负责盯守,确保一旦险情扩大能够及时处置?”

传统的河长制竟能引出“危房房长制”,陈露霞的发言让在座的不少委员感到新奇的同时,也引起了省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苏晓梅的共鸣。苏晓梅补充说,相对于城市住房,农村的自建房还存在监管空缺,“3年前金华磐安县万苍乡雅庄村的礼堂坍塌事故,我至今感到痛心,这就是农村自建房没有监管造成的恶果。”对此,苏晓梅表示,希望在“全面建设平安浙江”这块内容中补充“切实加强农村建房的安全与监管”的内容。

道路监控作用大,但补光灯有些刺眼

作为中汇(浙江)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,过去,政协委员袁小强的话题总是绕不开法律、税负。不过这一次讨论会上,他却忍不住谈起了自己对平安浙江建设的切身体会。

“平安是福,生活在浙江是幸福的。”袁小强说,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,我省加强道路交通等综合治理,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,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22.6%。针对这个话题,袁小强特别展开谈了道路监控的问题。

目前,我省正建立不断完善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的“天罗地网”,而道路视频监控往往成为很多案件侦破的关键环节。不过路口探头刺眼的夜间补光灯还是让袁小强有些不吐不快。

“有时晚上经过有监控的路口看到很亮的灯,车过此处就会突然‘眼前一黑’,看不清过路的行人和车辆。这是一个较大的安全隐患。”袁小强表示,自己了解在路面设置这么多补光灯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,因为补光灯可帮助更好地记录交通违法行为信息,如遇犯罪分子更可帮助拍下其清晰的面部特征。而他之所以借讨论会反映补光灯“刺眼”问题,还是期望



相关部门能更关注老百姓的直观感受,从亮度或方向等方面对夜间补光灯进行改进,“毕竟打击犯罪和市民行车安全都很重要”。

要打造“诚信浙江”的金字招牌



罗卫红在说起政府工作报告的味道时,也提到了信用的社会治理功能。在罗卫红看来,社会信用也是一个新兴大市场,“信用的社会治理功能,绝不可小视”。

法律是治国之重器,是人民权利的有力保障,也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。罗卫红说,诚信的建立,既要靠每个人的自觉,更要靠法律的规制。只有每个人都自觉在法律的规定内活动,诚信之风才能树立起来。“因此,既要加快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进程,完善体现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,推进司法公开公正,又要加大诚信文化的宣传普及力度,形成诚实守信光荣、违约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。”

她说,浙江人的价值观里一直强调“务实、守信、崇学、向善”,“在诚信建设这块内容上,我们浙江能否先走一步,真正做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,让守信者畅通无阻?”

从空气中的雾霾,说到脚下的土壤

这些提案,为各种环境问题开“药方”

本报记者 王索妮

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两会期间的高频词,今年当然也不例外。

记者注意到,为了让浙江的天更蓝、水更清、山更绿,不少政协委员结合自身实际,从各自领域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,而这些意见和建议,或许就是为各类环境问题开出的“药方”。

包庇环境违法行为,领导该引咎辞职

关于雾霾,网上早已有数不清的段子了。都知道雾霾原因包括工业污染、机动车尾气排放、扬尘污染、秸秆焚烧污染、非清洁能源使用等,但具体到某个城市、某一天,造成雾霾的主因究竟是什么、占比多少,大伙儿却无从知晓。在省政协委员、慈溪市台办副主任陈益萍看来,这也就造成了雾霾人人有责又人人无法负责的怪圈。所以这一次,她的提案旨在完善雾霾治理机制。

尽管新环保法已实施,不过陈益萍表示,环保领域仍存在着“守法成本高、违法成本低”的现象,也是目前无论从行政执法还是从环境司法的角度来看,都必须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。对此,陈益萍建议,首先应建立雾霾源解析责任体系,从重

点城市开始,加强雾霾来源分析,通过高科技手段实时指出当天某个城市雾霾的几大成因,量化各污染源的百分比,而一旦环保部门开出罚单,罚款可用于人工削减雾霾等方面的环保治理工作。

新环保法赋予了环保部门职责相称的监管处罚权,也将民间力量有序纳入。陈益萍认为,我省应在此基础上尽快出台配套细则,强化环保执法工作。“比如,包庇环境违法行为的领导干部,是不是可以依法让其‘引咎辞职’?”在她看来,只有加强执法惩治力度,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,我们才有可能和雾霾天说“拜拜”。

治水办人员流动过快,最好3年一轮岗

2013年,当“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”之声不绝于网络时,浙江吹响“五水共治”集结号。而如今,治水不仅仅是战天斗地,更是着眼于问诊产业,谋求转型。

4年过去,面对越来越多的碧水清流,在欣喜之余,我们也会心生忐忑:浙江的河流能一直美下去么?为此,省政协委员、丽水市政协副主席齐育华带来了提案——《健全完善“五水共治”长效管理机制的建议》。

在调研中齐育华发现,作为系统性工程,“五水共治”还是存在职责不明、工作不畅等问题,比如治水办人员基本上一年一换,不利于工作。她建议“治水办抽调人员3年一轮岗。”她

也提出,建立相邻地方政府的协作联动机制也十分必要,“同一流域相邻的县(市、区)政府应当共同建立水污染防治协商协作机制,跨行政区域流域应由所在区域共同的上级政府建立联合防治协调、信息共享、联合监测、联动处置机制。”

加大科技投入,设立土壤污染修复试点

同样是关注环境保护,省政协常委、民建省委专职副主委郭吉丰和他的《关于加强建设用土地壤环境风险防控的建议》,则是要为脚下的大地代言。

台州路桥固废拆解业、温州平阳制革业、湖州长兴铅蓄电池业、宁波鄞州电镀业……这些传统工业业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重工业土地污染区。这两年,随着我省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,像这类在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污染企业早已关停或搬迁。但传统工业污染地块到底有多少,污染程度如何,不得而知。土壤污染监测的准确度、污染治理与修复的技术水平,都不是很高。

根据郭吉丰的提案,我省首先应该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规,同时建设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,布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基础点位和风险点位,以获取权威、统一、高精度的土壤环境调查数据。根据土壤污染状况,选取一些典型性的、有再开发利用价值的地块优先进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的试点,研发适合我省的土壤污染治理技术。